

# 吴禄贞史事考订

赵宗颇

近些年来,研究吴禄贞的论著,相继问世,但在评价这位在辛亥革命史上叱咤风云,威名显赫的人物时,由于各家援引史料不同,以致有些史实歧异,莫衷一是。而这些史实又直接关涉到吴禄贞一生业绩的评论,需要加以考证,以求符合历史实际。本人根据掌握的资料,拟对下列问题做些考订。

## 一、吴禄贞赴日留学日期考

吴禄贞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武备学堂选派送往日本留学,是他一生中重大转折时期。因此他究竟在哪一年去日本,就成为我们评价吴禄贞的重要史实。据我所知,解放前史籍记载这件事时,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。第一种是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整理的《吴禄贞传》,其中记述道:“17岁的时候,……湖北开办武备学堂,禄贞便弃文从武,入校就业,另求深造。入校不久,因为学业冠群的缘故,就被官厅选拔派送日本留学,考入士官学校。”<sup>①</sup>这篇《传记》明确地指出吴禄贞是在17岁时入武备学堂,而且不久被派往日本深造。先要弄清这里的17岁是指虚岁,还是实足年龄?这对我们确定年份是至关重要的。所幸《传记》的结尾部分有“死的时候,只有32岁”一语,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人们知道吴禄贞生于1880年3月,死于1911年11月,显而易见,32岁是虚岁,同样17岁也是虚岁,那年是公历1896年,也就是说吴禄贞是1896年赴日留学的。第二种是无锡人钱基博写的《吴禄贞传》,该传说吴禄贞“年18,以鄂督张之洞命赴日本,习为骑将”。<sup>②</sup>这里的18岁,也是指虚岁,即1897年东渡扶桑求学的。邹鲁著: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也持此说。

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和刊行的书籍,更是言人人殊,各执一词。有的说吴禄贞是“1896年入湖北武备学堂,次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骑兵”。<sup>③</sup>有的说吴禄贞是“1899年东渡是当时中国政府最初派赴日本的留学生之一”<sup>④</sup>。孙武的女儿孙莒芹回忆她父亲与吴禄贞、傅慈祥交往时写道:“1897年先父考入湖北武备学堂,与吴禄贞、傅慈祥为同学。……翌年,吴、傅二人官费赴日留学”。<sup>⑤</sup>据此,吴禄贞是1898年往日本就读的。

从上面引述的各家论点看,要搞清吴禄贞东渡留学日期,必须先要弄清吴禄贞入武备学堂

① 《革命人物志》(台湾版),第2集。

② 张难先:《湖北革命知录》,或见《辛亥革命》(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),第6册。

③ 贺觉非、冯天瑜:《辛亥武昌首义史》。

④ 吴宗亚:《吴禄贞与辛亥革命》,见《武汉文史资料》1986年第4辑。

⑤ 《武汉文史资料》1986年第4辑。

的年代,因为吴禄贞是由张之洞从武备学堂选派赴日深造的。我们从张之洞上奏清政府的奏折里知道,湖北武备学堂是他奉清政府之命,自1896年着手筹办,翌年正式开学。<sup>⑥</sup>吴禄贞是于1896年入工程营当兵,1897年被张之洞遴选入武备学堂。与吴禄贞同时入该堂就读的有孙武、傅慈祥。据高筹观写的《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》记载说:“十八岁考入武备学堂肄业,同学有吴禄贞、傅慈祥诸人。……明年,遴选吴、傅东游,公亦预选。濒行,母泣留,不果行。”<sup>⑦</sup>这年为1897年,同孙莒芹回忆的年代相吻合。吴禄贞与孙武同庚,可知也是1897年进武备学堂的,第二年被张之洞派去日本留学,与吴禄贞同行的有傅慈祥。查阅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收入的《潜江傅君良弼墓表》,只记载说:“及派留学东瀛,入成城、士官诸校”,笼统提及,一笔带过。也许傅烈士家属预想到这样记述,未免语焉不详,徒劳后人猜度,便根据他们了解的实情,写成《事略》附在这篇墓表后。《事略》较详细地记叙了傅慈祥的一生事迹,其中指出“入省武备学堂,研究兵学,屡试辄冠其群,大为师友器重。戊戌派赴东瀛,留学成城学校,旋入士官学校”。这段话可视为墓表的注文,明确地告诉人们傅慈祥是于1898年去日求学的。既然吴禄贞与傅慈祥同行,自然也是在1898年到日本的。这和当时清政府施行派青年学子出洋留学的政策密切相关。

1898年6月,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乘维新变法高潮来临之机,上奏清廷力陈日本变法取得成功,可资借鉴,请求多派人到日本学习。他说:“臣以为日本变法立学,确有成效,中华欲游学易成,必自日本始。”<sup>⑧</sup>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议奏,总理衙门表示采纳杨深秀建议,并饬令南北洋大臣、两广、湖广、闽、浙各督抚挑选年幼聪颖,粗通日文的学生,上报总理衙门以便分批陆续派往日本。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遵照总理衙门的指令选派吴禄贞、傅慈祥等20人去日本的。当时有的省份对派人出国留学并不重视,不肯多派,或者不派,因此仅派出56名,张之洞在地方大员中是力主多派有为青年出国深造的倡导者之一,所以湖北省派人最多,其中有不少人先入成城学校,继进士官学校,“自此始有中国官费生学陆军之事”。<sup>⑨</sup>我们从唐在礼写的回忆录中得知吴禄贞等人是在1898年冬离开祖国,东渡扶桑的。唐在礼说:“戊戌政变那年的冬天,我由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到日本去留学。”<sup>⑩</sup>显而易见,唐在礼和吴禄贞是分别由刘坤一、张之洞选派同期抵达日本的。由此可知,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记载吴禄贞于1896年去日留学,是与事实大相径庭,不足为信。其它诸说也是站不住脚的。

## 二、吴禄贞从日本回国日期考

吴禄贞是最早把革命火种引进鄂州大地的人之一,那么,他究竟是哪一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武昌?就成为我们了解湖北革命正式兴起的关键年代。如同吴禄贞何年赴日留学一样,也是诸家各有所据,说法不一。我们还是先以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所收《吴禄贞传》为例,该传记载说:“纪元前十一年(清光绪二十七年,西历1901年)禄贞毕业回国到了武昌,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他训练新式军事人才。”清楚地指明吴禄贞是于1901年回到武昌的。和这种说法相

<sup>⑥</sup> 参见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45,奏议第13—16页。

<sup>⑦</sup> 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7辑。

<sup>⑧</sup> 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,第248页。

<sup>⑨</sup> 张之洞:《抱冰堂弟子记》,第17页。

<sup>⑩</sup> 唐在礼:《辛亥革命前后我所经历的大事》,见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(六)第328页。

同的有王保民写的《吴禄贞首先参加革命的见闻杂记》，也说吴禄贞“1901年毕业士官学校回国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为训练新军教官”。<sup>⑬</sup>其次钱基博的《吴禄贞传》只是说：“（自立军起义失败后）禄贞只身走大通，变易姓名，间行复东渡留学，未几返国，授徒武昌。”“未几返国”，言辞含混，难以判断具体日期。熊秉坤写的《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》一文提到“迨吴禄贞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归国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委吴为新军教练官。”也未指明具体年月，因此在文章后面特加以注释，指出吴“于1902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自日本返鄂。”<sup>⑭</sup>李廉方撰写的《辛亥武昌首义纪》说：“先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（癸卯年相当于1903年）吴禄贞毕业回鄂，与武汉有志之士谈革命。”等等。比较诸说，我认为1902年说切合历史实际。根据是：第一、吴禄贞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：“禄贞十月初旬卒业陆军士官学校，当即入彼近卫骑兵联队教彼新兵，归国之期，大抵在二、三月间耳。”<sup>⑮</sup>原信未注明日期，有的书收录该函时，推测为1901年初，但从信中有“十月初旬卒业陆军士官学校”一语，显然指的是1901年阴历10月，因此不可能是年初，阴历十月初旬，相当于阳历11月头十天。据田久川考证第一期士官生的入学时间为1900年6月，毕业时间是1901年11月。<sup>⑯</sup>田久川考证的日期和吴禄贞谈的毕业时间完全相同。按照士官学校规定，毕业生必须到联队实习3个月至6个月不等，所以吴禄贞告知汪康年，他预计来年阴历二、三月间回国，也就是1902年4、5月间。最近看到日本学者寺广映雄写的《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》一文，提到“1902年4、5月间吴禄贞毕业于士官学校回到武昌。”这又和吴禄贞谈的归国日期相一致。第二、丁果在日本查阅士官学校资料时发现了吴禄贞毕业考试成绩单，战术学13.4，军制学13.6，兵器学13.9，地形学13.9……上面注明考试日期为1901年10月。<sup>⑰</sup>10月份考试，11月正式毕业，也与吴禄贞自述日期完全吻合。

依据吴禄贞自己讲的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时间和预订回国的日期，再参照原始资料，可以断定吴禄贞是于1902年4、5月间回到武昌的。我在1981年写的《吴禄贞》一书时，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曾将吴禄贞归国日期定为1901年冬，现在看来是不确切的，应当以1902年4、5月间回国，更合乎实际。借此机会，加以订正。

### 三、吴禄贞被害情节考

有关吴禄贞被害的情节，也是众说纷纭，互有同异，譬如谁是谋杀吴禄贞的元凶，就记载不一，我一向主张是袁世凯主使原第六镇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暗算吴禄贞，再由周符麟收买吴禄贞部下第三营营长马惠田直接行刺，至今仍坚持原来看法。至于为什么说袁世凯是主谋呢？早在1979年拙作《论吴禄贞》一文中（见《上海师院学报》1979年2期）已有详细论证，不再赘述。现仅就吴禄贞是被刀砍，还是被枪杀致死，做些考订。

解放前出版的书籍和文章，在谈及吴禄贞被害细节时，大多记载说凶手是使用手枪杀害的。例如郭孝成的《山西光复记》说：“吴（禄贞）是事起仓卒，未及为备，急觅逃路已不可得。而

⑬ 皮明麻等编：《吴禄贞集》，第319页。

⑭ 《辛亥首义回忆录》第1辑，第19页。

⑮ 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第1册，第367—368页。

⑯ 田久川：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》，见《辽宁师院学报》1982年第2期。

⑰ 《上海师大学报》，1987年第4期。

刹那之间,吴之胸际,已着三弹,遂仆。马某即一跃而前,亲割吴首。”<sup>①⑥</sup> 钱基博的《吴禄贞传》和张难先的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也都说凶手枪杀吴禄贞。但也有些著作记述凶手是挥刀砍死吴禄贞的。比如由孔庚口述,居正修笔录的《先烈吴禄贞殉难记》,就是这样说的。孔庚说:“谁知马惠田双腿打恭下去(满洲礼),一面就摸手枪,吴见其来势不佳,便绕桌子跑走,跑了几圈,想向后门跑出去,那知后门早有人拦住,就把他砍死,割去了脑袋。”<sup>①⑦</sup> 还有一厂的《暗杀史》一书,也说吴是被刀斩而死,但与孔庚所记情节,大有出入。该书原文是“九月十七日夜,突有第一镇两管带到营求见,谈约二十分钟,两管带起身告辞,禄贞送至楼腰(系借住站长西式楼房)两管带乘其不备,抽刀直砍,割其头以去”。天嘏的《南北春秋》也有类似记载,不再征引。(以上两书,均收入陆得璇编《满清稗史》)。

我认为要判明是枪杀,还是刀劈致死,最好查阅当事人的记载比较可靠。可惜当时在吴禄贞身边的两位亲临其境的张世膺和周维桢,都与吴禄贞同时遇难,而行刺的凶手又始终逍遥法外,更无供词,可资查阅。幸好吴禄贞挚友何遂,在事件发生时,他正住在吴禄贞居室的隔壁房间,是最早到达出事地点察看吴禄贞被害情形的知情人。他说:“我慰劳晋军回来,已经夜十一点多了,很疲倦,倒下便昏昏睡去。酣睡中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,瞿寿堤顿着脚喊道:‘兵变!兵变!你赶快去调山西的队伍来镇压。我一摸身边的手枪,没有找到,随手抓起一把短剑冲出门去。……忽然一队人从吴禄贞的住室中奔出,迎着我跑来。我大叫‘站住!站住!’这些人也不理我,愈跑愈快,一溜烟就不见了。……我穿过外面的一条过道,刚到绥卿的居室门口,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,定神一看,正是吴绥卿。……我一惊,伏下身去大叫‘绥卿!绥卿!’再摸他的双手,冷冰冰的全是血污,头已经没有了。”<sup>①⑧</sup> 这段回忆录虽然没有指明吴禄贞是被枪击致死,但从行文中完全可以看出何遂是在听到枪响后,赶往吴的住处,途中遇到一伙人正从吴的居室奔出,不言而喻,这伙人正是行刺吴禄贞的凶手,他听见的枪声,就是他们放的枪,致使吴禄贞饮弹躺在血泊里。头颅是在吴禄贞中弹后,被他们割去作为向袁世凯请赏的信物。我们还可以从张国淦的《辛亥革命史料》中找到有力的旁证。张国淦记述说:“十六日夜十一点多钟,吴正与参谋张世膺、副官周维桢在车站办公室批阅机密文牍,马惠田带同参谋夏文荣、队官吴云章、排长苗得林等四人,进见吴,客厅外是个小院,马说‘来向大帅贺喜’,打千下去,就从衣服下拉出枪来。吴一看不对,一手拉出枪,从窗口冲到院子里,跳上墙。马等连击,吴腿中弹跌下,回击,马等向外跑去,吴在后面追。走到墙外,伏兵起;头部中弹倒地死,并丧其元。”张国淦声称这段记述是参据《何遂日记》写成的,这样我们可以视为何遂上面那段回忆的补充说明。吴禄贞是“头部中弹倒地死”的。当时还有一个知情人——元柏香,他是吴禄贞的学生,应吴之召从北京到石家庄任马队司令,他事前从结拜弟兄瞿寿程(时任随军运输科长)口中得知马惠田要暗害吴禄贞的密谋,立即将这一情报,报告给吴禄贞,吴不是采取加强警卫措施而是派人把马惠田找来,直接了当地问马:“听说你要杀我,你就杀罢。”马急跑吴面前说:“统制待我甚厚,我天胆也不敢。”吴说:“量你也不敢,起来去吧。”瞿寿程马上把吴禄贞同马惠田对话的经过,告诉了元柏香,元这时已经睡下,一听到这个不祥消息,立即意识到这会促使马惠田下决心杀吴,便匆忙起来穿好衣靴。忽闻枪声四起,与瞿同去吴室“见张参谋长被杀于站台,吴尸仰卧室中,头被割

<sup>①⑥</sup> 《辛亥革命》(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)第6册,第178页。

<sup>①⑦</sup> 《云梦文史资料》第一辑,第89页。

<sup>①⑧</sup> 何遂:《辛亥革命亲历纪实》,见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(一),第477—478页。

去。”这与何遂的记载,大致相同。我们再参阅其他诸种著述,可以判定吴禄贞是饮弹牺牲的。那么如何看待孔庚的口述呢?我认为孔庚的这份口述,是他在旅途中与友人闲聊,谈起往事,想到什么说什么,不可能做认真追求,又系由别人笔录,事后整理成文,只能作为参考。何况孔庚在追忆吴禄贞这段罹难史时,首先讲明“据说,那天马惠田手持红贴……”。这就昭示后人,他所叙述的事件经过是耳食之谈,姑妄听之。至于《暗杀史》、《南北春秋》两书所载,更不足为凭。因为史学界同行经过多年研究,已公认马惠田是直接杀害吴禄贞的凶手,这就否定了所谓旗籍两管带抽刀砍死吴禄贞的记载。正因为如此,当1913年11月7日吴禄贞遇害两周年忌辰,在石家庄正式为这位爱国将领举行安葬仪式时,也举行了为墓碑揭幕典礼,这块碑是由闫锡山署名的《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》,明确指出:“枪击公,中要害,遂取公元以去”。作为信史,留传世上。

#### 四、吴禄贞一张站立照片拍摄年代考

吴禄贞身着戎装,头戴军帽,手握战刀,目光炯炯,直视前方的一张站立照,被人们看作最能体现吴禄贞军人气质的全身像,所以广为各种著作所采用,但这张照片摄于何时,除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辛亥革命》(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)第6册标明为“在石家庄被刺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”外,大多笼统地写“吴禄贞先生遗像”(请见曹亚伯著《武昌革命真史》正编)。或者只注明“吴禄贞”,均未指明摄影年代。拙著《吴禄贞》一书,曾根据上述《辛亥革命》对这张照片的注文,写明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时的留影,现在看来是不确切的。最近翻阅1912年1月6日《申报》,惊喜发现了这张照片拍摄年代。这是吴禄贞于1910年7月奉清政府之命赴德、法两国参加阅兵,途经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,与在该国陆军学校学习的李梁(李梁详细情况,待考)相见,俩人系湖北同乡,又阔别多年,忽于异国相逢,其欢快心情,不问可知,吴禄贞特意将自己的近照赠送给李梁,留为纪念。上面有吴禄贞亲笔题字,弥为珍贵。从题字内容来看,该片摄于宣统二年,也就是1910年,当时吴禄贞职衔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。现将吴禄贞题字全文,抄录如下,与读者共享。

宣统二年秋阅兵德、法,道出比都,晤李梁三弟,计自鄂诸分袂,十年于兹矣,海外重聚,快乐万状。李梁将学为武将,肄业比国陆军学校,将来必为吾辈后起之秀。国家多事,李梁勉之。小兄吴禄贞写记。

